

梅娘和张爱玲的三次“交往”

■荣挺进

1944年北平马德增书店和上海宇宙风书店读者调查评出来的“南玲北梅”，现在很难查出当时的读者评语或书店说法了。梅娘自己则说“那是几个书店老板的商业策略”。

《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中收录了两篇短文、一个故事和致朋友的三封书信，记录了梅娘一方对“南玲北梅”关联的论述。

梅娘与张爱玲有过始终不曾交流的三次“交往”。

第一次是1942年夏初(时间不准确),中南海有一个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然而在众多的淑女、男士的簇拥下,梅娘千寻万觅,只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儿淡雅”。因为张爱玲簇拥在众人包围中,梅娘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

第二次在1944年冬,上海兰心大戏院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的话剧《倾城之恋》。“朋友们劝我去看看,就便结识张爱玲……我们赶到兰心,排练已经结束,在众人簇拥中走向台下的张爱玲,长发披肩,一件绛红的旗袍,直觉,正是她为流苏界定的怯怯的身材。”剧院外飘着冷雨,因为张爱玲又被簇拥在众多的名艺人中间,梅娘便未上前搭话。

第三次已经是1995年初夏,梅娘趁在美国逗留的机会,托《中国时报》的朋友联系张爱玲,“很想跟她侃侃诸如女儿儿等等的话题”,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陌生人一律不见!”“我当然是陌生人

了,难以分说的遗憾又一次袭上心头。”

对于张爱玲的作品,梅娘用四个词——“冷隽”、“深邃”、“浓艳”,以及“惭愧”,表达了自己真诚的敬意。

1944年“南玲北梅”开始并称的时候,“我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为她的深刻、浓艳所倾倒……”“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是女人的异类,遭遇她就像遇上的喷着毒液的蛇。我真佩服张那不动声色的冷峻,反正我写不出来。”这是她所欣赏的“冷”。

“再读《金锁记》,曹七巧从贪恋黄金到被黄金吞噬,只余留了一种最最可怕的情感——复仇!凡是自己未曾拥有的,谁也不准拥有,哪怕是自己的女儿。这是魔鬼的逻辑!读到曹七巧用市井淫秽的语言开心地挪揄初恋的女儿时,我毛骨悚然了。冰冰冷的黄金吃掉了至情的母性,这多么可怕,张爱玲,你是揭露得多么淋漓!”这是她看到的“深”。

梅娘还反复地玩味张的“浓艳”或者隽永:“张爱玲这样塑造了倾城之中的女主人公流苏:‘怯怯的身材,微风振簪般的声音……’多么传神!这是个十足令男人怜爱的女人。”为此,梅娘总是自我表白:暗自惭愧,无资格与她并列;“我仍然十分惭愧,因为至今,我尚未达到她的高度,愧对并称。”“张爱玲那种‘剔肉刮骨似的对社会的铺陈’,那种‘深邃的冷峻’,“我做不到,我没有那样的生活体验,也没有她那样的磅礴才气。”这是一份由衷的对张的“敬佩”。

但梅娘自有她的倾向和判断,“张爱玲曾给予我的震撼”,是与“我感到的遗憾”相当的。“掩卷之余,一缕惆怅爬上心头,仿佛流苏在我耳边絮语:‘倾城之际,你要抓牢男人!’我反问了,为

什么是抓牢男人,而不是与男人共同奋进呢?”她说:“我盼望能在张爱玲那如椽的大笔中,看见奋发图强的女侠,看见女人们在新的主义中获得新生。可她让我看到的是曹七巧、是流苏。我一点也不喜欢流苏,更憎恶曹七巧。流苏是我熟悉的拴在男人裤腰带上享受荣华富贵的我的大姐们,而曹七巧是比逼走我生母的掌家夫人更泯灭了人性的恶婆。”

对此差异,梅娘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我认为: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生活理念,自然会导出不同的生活实态。”

这的确点出了她们之间根本的差异:作品里张爱玲“深邃的冷峻”,来自生活中“爱抚的渴望”的完全失落;梅娘自幼有慈父的宠爱,使她从不放弃创作时理想信念的诉求。而个性里面,梅娘矜持、朴素、大气、坚韧的品质,都源于因饱满充实的关爱生成的自信,这种信心的支撑,使她在任何挫折之下,都拥有心灵的“安稳”,而不必向外的世界去寻找“安稳”。“如果问我为什么能阅尽沧桑活到耄耋之年的秘密,那很简单,一颗永不休止的求善之心而已。”这飞扬的“求善之心”,溯源于她儿时充分体验过的“善待”。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带来的两个无法交汇的创作走向,“我没有她的深邃,我的书生气质和忧国激情,能配上她的深邃可能就完美了”。梅娘的这一期望,恐怕很难实现。不要紧,梅娘对张爱玲的观察和评价本身是恰当、准确的,她不必低抑自己的路数,“张爱玲的大红大紫,是社会接纳了她。我之被冷落,是我没有她作品中所展示的意境。”这一节话,评张是对的,自评却不尽然。(节选自凤凰网文化)

两个女人的战争

■帅帅

日本平安时代有两个大才女,一个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紫式部,她的《源氏物语》被称作是“日本的《红楼梦》”;一个则是大家不那么熟悉的才女清少纳言,著有随笔集《枕草子》一书。按说两个人都是同一个时代的才女,理应惺惺相惜,可事实情况却是,这两个人相互都看对方不顺眼,不时相互非薄一番。

有位日本女作家评价紫式部和清少纳言,说紫式部眼光比较阴森,为人很难相处,凡事总看到不好的一面,嘴也很刻薄尖酸。清少纳言与她截然相反,遇事总能看到良善的一面,容易感动,性情温柔,待人友善。较紫式部而言,清少纳言更接近古典女人。

紫式部据说长得就一张大麻脸加苦瓜脸,虽说很有才气——从《源氏物语》中那种浮世绘般艳美可见其冲天才气,内心其实也极为女人。遗憾的是,上帝弄人,没有给她和她的文笔一样美的外在,这使得她没有什么东西,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把内心的东西用“意淫”的方式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源氏物语》中的几个女子也许就是她的理想女性化身。

而清少纳言呢,她不但才气不次于紫式部

而且还具有典型的女性温婉和风情,很有男人缘,因此在紫式部看来她是一个轻浮和卖弄的人。紫式部看不起清少纳言的自以为是,而清少纳言则认为紫式部长着一张麻将脸,没男人喜欢,反而来嫉妒她,对她也很是不屑。清少纳言不客气地说紫式部像个絮絮叨叨的孤单的老太婆,“羡慕别人的幸福,感叹自身的不遇,喜欢谈论别人的事,对于一点小事都喜欢打听,如不告诉,便埋怨人家”。

紫式部在《紫式部日记》里评判当世才女,唯独对清少纳言恶言相向——“清少纳言是那种脸上露着自满,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总是摆出智者才高的样子,到处乱写汉字,可是仔细地一推敲,还是有许多不足之处。像她那样时时想着自己要比别人优秀,又想要表现得比别人优秀的人,最终要被人看出破绽,结局也只能是越来越坏。总是故作风雅的人,即使在清寂无聊的时候,也要装出感动人微的样子,这样的人就在每每不放过任何一件趣事中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不良的轻浮态度。而性质都变得轻浮了的人,其结局怎么会好呢。”

两人都在皇宫做过女官,不过,清少纳言出

宫的时候,紫式部还未入宫,两人连面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评价实在有些苛刻。至于她这话的背后是否出于嫉妒,或是源自他们各自主子之间的微妙关系,时至今日,早已不得而知。

假想一下,如果紫式部和清少纳言不在同一时期,一前一后,中间差个百八十年,女人天性中的醋意和嫉妒稀释掉了,也许我们会看到惺惺相惜,可能会读到其中的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深情且精辟的评价,就像维吉尼亚·伍尔夫谈论简·奥斯丁一样,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欣赏和理解。

可惜她们生在了同一个年代,她们在同一个价评体系里,就像跷跷板的两端,这头高上去了,那头就得掉下来。她们是抑扬的对立关系。同为女人,嫉妒似乎是宫闱世界历史的习俗。

另一个原因大概就是自古文人多相轻的习俗。说起文人相轻,其实也是一种生物性的本能体现,说白了也是生物生存竞争的社会化的一个表现。所谓同行是冤家,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文人也不例外,文人们在一个生存环境中争夺生存资源,当然也遵循动物最基本的丛林法则,不能免俗而已。



图片来源:眼图网

开发区

■潘维

那熟雨,没押古韵,就把一张蓝图描画在稻田里。

从超市,我取下十一月,同时删掉掉对忧伤的无限谄媚。

推土机将自然村演义成集体农庄。

新,孩童这虚拟假寐的新,不认识老人。

确实,机器里工作着一支物质医疗队:

鼠标,白大褂,请你服下信号的彩色胶囊。

哦,我误入了哪儿?另类桃花源?国际体?终极罗网?

是否垂钓了白日梦?可能不小心,我释放出了龙身蜿蜒的愿景?

深深地,比流水线的微尘镶嵌得还精确,我承认,

所有事情,无非一台麻将:生化学搓和了湖光山色;

或者,广告给了地球一个支点。翻云覆雨的化妆师隐藏在聚光灯背后。

在任何时代,速度都将受到悖论的追问:穿越本质,又如何快到慢里。

(选自《诗建设》,泉子主编,作家出版社)

毁灭一个人就是毁灭所有人

■胡泳

“看客”:“……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对鲁迅而言,冷漠不是偏见,是中国最麻烦的事情。死刑现场的围观人群几乎和加害者一样令人厌恶,而且似乎更该惩治。就围观受害者这种国民劣根性来说,鲁迅的矛头所向,不限于阻止对受害者被视为失败者的场合,即他愤怒于国人的幸灾乐祸恶习——见失败者遭受灾祸而高兴,也指向受害者被视为英雄或圣人的场合,即他同样愤怒于国人以高标准道德要求受害者的“烈士情结”。“我们局外人”大江健三郎在《广岛笔记》中写道:“常常希望在每一个角落都能发现一位牺牲的圣者。”

对于后者,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林培瑞说得极为透彻:“如果我们以圣贤标准要求被迫害的英雄,那不但错误,而且不公平。创痛和凌辱通常不会使人们离圣贤标准更近,而会更

远。受害者在压力下会撒谎,欺瞒,也会出卖。旁观者没有权利期待与此不同的事实……看客看到英雄在角斗中获胜的热望甚至可能是更加危险的。对于一个生活在安全和舒适中的旁观者来说,他有权指责他人缺乏英雄气概吗?甚至当别人不如理想中的那般英雄的时候出来大肆批评?然而,很多中国旁观者恰恰就这样做了,这是道德愚钝。生命危险不是剧场表演。渴望烈士的人应当自己去做到。”

林培瑞进一步指出,尽管对受害者富有同情心通常比冷漠更可取,然而,同情姿态也不是没有自身的伦理问题的。哈维尔讲过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布拉格接待西方“看客”的故事:他们如此热切地想表示对一个真正的“异议分子”的支持。哈维尔说,当西方人问“我们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他心里倍感挫折。因为这样问意味着只有异议者而不是同情者的命运受到威胁。“难道对我的逮捕不是对来访者的一种攻击吗?……难道对布拉格的一个人的毁灭不是对所有人的毁灭?”

远。受害者在压力下会撒谎,欺瞒,也会出卖。旁观者没有权利期待与此不同的事实……看客看到英雄在角斗中获胜的热望甚至可能是更加危险的。对于一个生活在安全和舒适中的旁观者来说,他有权指责他人缺乏英雄气概吗?甚至当别人不如理想中的那般英雄的时候出来大肆批评?然而,很多中国旁观者恰恰就这样做了,这是道德愚钝。生命危险不是剧场表演。渴望烈士的人应当自己去做到。”

远。受害者在压力下会撒谎,欺瞒,也会出卖。旁观者没有权利期待与此不同的事实……看客看到英雄在角斗中获胜的热望甚至可能是更加危险的。对于一个生活在安全和舒适中的旁观者来说,他有权指责他人缺乏英雄气概吗?甚至当别人不如理想中的那般英雄的时候出来大肆批评?然而,很多中国旁观者恰恰就这样做了,这是道德愚钝。生命危险不是剧场表演。渴望烈士的人应当自己去做到。”

远。受害者在压力下会撒谎,欺瞒,也会出卖。旁观者没有权利期待与此不同的事实……看客看到英雄在角斗中获胜的热望甚至可能是更加危险的。对于一个生活在安全和舒适中的旁观者来说,他有权指责他人缺乏英雄气概吗?甚至当别人不如理想中的那般英雄的时候出来大肆批评?然而,很多中国旁观者恰恰就这样做了,这是道德愚钝。生命危险不是剧场表演。渴望烈士的人应当自己去做到。”

失衡的南朝

刘穆之的“槟榔之怨”

■蔺家平

中国人常说两句俗语,一句是“狗眼看人低”,一句是“慧眼识英雄”,说的其实是一回事——人的眼窝子深浅问题,但褒贬之立场却泾渭分明。文学作品中一个模式化的叙事结构是:公子落难,小姐搭救,小人掣肘,最终公子功名成就,与小姐喜结连理,而掣肘之人或颜面无存悔不当初或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样的故事看得多了,国人血脉中自然有一种观念生了根——别看你现在穷困潦倒,保不准有朝一日就能飞黄腾达,现在瞧不起他,将来后悔去吧。

还是先说一个故事吧。东晋末年,尚书左仆射刘穆之是为刘裕代晋建立下汗马功劳的股肱之臣,据《南史·刘穆之传》记载,他“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壅滞”,每天办公室门口排着长队,等着他理事决断,他则一边看着文件报告,一边笔走龙蛇,一边听着汇报,一边口述决定,可谓纹丝不乱,井井有条。

如此风光无限之人,或许你想象不出来此人曾经居然是个无赖小混混。原来,年轻时刘穆之家里很穷,但他嘴巴却很馋,便到处死乞白赖地蹭吃蹭喝。娶妻成家后,更是常到大舅哥家吃白食,人家朝他翻白眼他也视而不见。他老婆江氏本是名门之后,觉得脸上挂不住,便常常唠叨,不让他去。有一次,江家宴客,特意让人捎话叫刘穆之不要去,可他还是不清自到,吃饱喝足后,又腆着脸讨吃槟榔以助消食。江氏兄弟实在忍不住,便嘲笑他:“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需此?”意思是说,槟榔是用来消食的,你老兄连饭都吃不饱,还用得着吃这个?江氏知道此事后深以为耻。

后来,刘穆之跟着手握重兵的刘裕混,逐渐发达了,做了丹阳尹。一天,他让妻子请江氏兄弟一聚,江氏一听就慌了,以为他要报复江家人,哭着跪下磕头求情。刘穆之说:“本不记怨,无所致忧。”意思是说,我大人有大量,并没有对他们怀恨在心,所以不用担心。结果那一顿饭,江氏兄弟吃得酒醉饭饱。临了,刘穆之命厨人用金盘子端出一大盘槟榔来,送给江氏兄弟。

史上没有记载江氏兄弟见到这一大盘槟榔

革命祭坛,而不是像梁思成先生所倡议的那样彻底保护历史,其实最大的目标只有一个——为了重新诠释历史。这一点也体现在命名上,将中国历史与革命历史放在一起,实际上恰恰是为了区分古典中国和新中国两种历史的性质。由此而得到的建筑形象出奇地大,长长的柱廊让人们想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建筑风格。它真正是个社会主义建筑的典型,拥有意识形态所偏好的宏大体量,里面的展品收藏却与它的规格形式不相称。

当历史之书翻到了200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意味着,古典史与近代革命史之间的界线已被国家的概念所涵盖。但是,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国家的形象呢?

2004年,北京举办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国际招标”就是一场新国家形象的预演赛。与50年前的拆旧建新正好相反,新的国家博物馆以历史主义为原则——任务书要求保留旧的历史与革命博物馆的四个立面。库哈斯提出的社会主义经典说在此得到了回应。这就是说,新的国家形象必须从红色经典的胚胎里产生出来。虽然不少世界一流的建筑师努力给出了别具一格的答案,但是,最有创意的,如H&D的方案却格格不入。我以为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无论如何,保持红色经典的原则使得张开济先生(原博物馆的设计师)要比梁思成先生幸运得多,在梁先生保护北京旧城的计划落空多年之后,国家的想象已经和整个天安门广场建筑群融为一体。此时,我们确实很难分清:旧北京的中轴线与新中国的政体式建筑群,哪个更具有中国精神?哪一个才能更体现国家的想象?

(节选自《被压迫的美学:视觉表象的文化批评》,冯原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时是否满口愧疚,不过以常情推之,想必如此。毕竟,几年不见,刘穆之再也不是当初的小瘪三了,江氏兄弟还会对他抱着居高临下、不屑一顾的心理吗?显然不会。不仅不会,他们大约还十分后悔当初没有看出这位大姐夫居然也有时来运转的命,大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感慨。

历来人们都把刘穆之款待江氏兄弟的事,当成他“心胸宽广、不计前嫌”的佳话来传颂,其实未必。因为“本不记怨”这句话明显是言不由衷的,否则他为什么刻意送江氏兄弟一大盆槟榔?他就是要翻翻他们当初刻薄自己的这笔旧账,让他们心生愧疚,并从他们的尴尬、惭愧、懊悔甚至惶恐中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快意。从这个意义上讲,刘穆之此举不仅不能佐证他心胸宽广,反倒暴露了他小人得志的心理。

后来诗仙李白写过“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的句子,想来彼时他的日子很不好混。刘穆之的经历和众所皆知的汉初韩信是一样的。韩信也未必真失夫。韩信在接受漂母接济的时候,曾说:“吾必有以重报母。”漂母生气地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可见,漂母并非看中了韩信是“潜力股”才出手相助,而是仅仅出于对韩信“不能自食”的可怜而已。韩信却有着某种极端的自负与自尊,总希望即便自己穷困潦倒,别人也应该能够慧眼识珠,尊敬他、赏识他、无怨无悔地供养他。殊不知,这样的宽己苛人,本身就说明了他在道德上的缺陷。

同样道理,刘穆之把怨气撒在江氏兄弟身上的逻辑,也是很厚道的。人的尊严从哪里来?首先是自尊,只有懂得自尊的人,才有可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所以,真正的大丈夫从来都爱惜自己的羽毛,不会容忍自己不顾脸面地蹭吃蹭喝,也不会对轻视自己的人心怀怨恨,更不会把自己受到的冷落归咎于他人的有眼不识泰山。他会坚守自己的内心和原则,不馁不弃,不急不忿,既不自怨自艾,也不怨天尤人,而是一步一个脚印,锲而不舍地走出人生的辉煌。

这一发问,让我们联想到德国路德派牧师马丁·尼莫勒批评德国知识分子在纳粹兴起的过过程中毫无作为的那段话:“起初他们迫害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迫害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迫害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句话。”

其实,尼莫勒牧师要表达的核心意思就是:人类是一个共同体,他人的不幸也就是你的不幸。没有什么比约翰·多恩那句“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可以更好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选自《新周刊》,第388期)

(本版未收到稿费的作者请与编辑联系)